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从《熊出没之重启未来》说开去

■文/左衡

2024年的《熊出没之逆转时空》,为该电影项目第一个十年画上了相当圆满的句号。随后不久,该项目在2025年春节档的片名公之于众:“重启未来”,同时也以醒目的“开启科幻最终章”为宣传语提醒着屏幕前的观众:是时候和属于“熊”的又一个阶段相见了。作为一个关注“熊出没宇宙”有年头,并且一直对包括动画片在内的中国电影之创新抱有高期待的观众,笔者对2025年这部新作抱有相当热切的关注与好奇。因为,至少从命名的角度,这个方案会给人一种直观印象:随着该项目进入第二个以十年计量的单位,它将重新规划、启动“未来的”——而非“过去的”——“熊出没宇宙”。而在“XX宇宙”这样的表述中,其隐含的意味至少涵盖了影像和叙事两个维度的创作野心。

单从一个片名来判断——或者说想象——一部影片的最终成色显然不科学。这也正像根据一部影片的IP影响、类型定位、主创阵容、投资成本、技术堆砌、粉丝数量、上映档期等等指标来判断影片的艺术质量、人文深度、社会历史厚度、市场接受效果等一样,无疑是并不科学的。这种不科学,在逻辑上的表现是搞不明白“充要条件”与“既非充分又非必要条件”之间的巨大差别;在实践上的表现则是:从以往的成功案例(连成功经验都算不上)中找出最容易操作的几个环节(多挣钱就可以办到的那些),主观意愿上将其放大为保证票房大卖的法宝。这个认知上的常识,以及有意无意无视常识导致的认知偏差,正可以解释2025年春节档失意的那几部影片何以如此,也可以提醒我们:文化工业的发达,一定是久久为功的结果,并无捷径。

回到《熊出没之重启未来》(下称《重》)的个案上,笔者期待的落空,一方面是观影者时常遭遇的一厢情愿的结果,另一方面,恐怕也有出品方和创作者没能满足观影者不断延展的期待,而只是延续以往成功案例模式的保守策略有关。这样的策略,在观众没有产生审美疲劳,或市场供应没有出现过更优质的竞品之前,可以有一定的效果和保证。而一旦

这两个条件改变,则保守的策略就不再是一种保险或保证,相反地,它更像是一道枷锁,一种负资产。举一个更明显的例证:漫威宇宙的复仇者联盟系列在2019年之后其口碑和票房快速下滑,也是这个常识在起作用。多年来,《熊出没》在春节档动画片的位置上仿佛占据了主场,但它终究会遇到新力量的挑战。即便2025年没有《哪吒之魔童闹海》这样巨无霸级别的影片,也必然会有另外某部影片来完成这个历史的任务。

因此,2025年考察《重》,其实也不妨看作是对中国电影上一阶段的某些创作生产方法做一次迟到的的总结,并对人类心理思维的惯性和惰性再次善意提醒。

有一些与《熊出没》相关联的事情,从电影史研究的立场出发,似有必要记录下来,因为,《熊出没》项目确实过去十余年间、在广大地域形成了某种富有中国特色的亚文化。首先是大量各式各样、或正规或不正规的商品,它们不但占据了大小商铺(包括电商)的货架,也出没在各地的儿童娱乐场所,熊出没主角造型的摇摇车一度是三线市场和乡镇商城标配。其次是不脛而走熊出没语言应用,熊二的语音成为许多短视频作者选择的表达音效,在《熊出没》电视剧片尾中滚动的演职人员名单和背景音乐也成为一种表达戏谑之意的“能指”“熊出没(发音为mei)”“熊大熊二”“虫大虫二”这样的仿辞至今还在北京某些小学生口头流行。用“IP单位”的方法对熊出没项目的价值进行重估、细算,用文化研究的思维对其进行社会影响加以描述,都有其必要和价值,尽管这显然是多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我们终究要在解决困难的过程中走向更加现代性的文化结构和文明模式。

对一个以儿童为基本受众的动画系列片来说,我们本不应如此苛责,但如果《熊出没》团队还准备继续前行,那么就必须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这个IP要如何重启未来?如果不能解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熊出没》就随时面临被放弃、被遗忘的危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两会上再次用“腾笼换鸟”“凤凰涅

槃”这两个形象的比喻,来阐发经济发展进程中新旧动能转换与衔接的道理。作为文化产业的领头行业,电影业无疑也担负着开发新质生产力的任务。总书记的妙喻,对于电影从业者,应当起到发聋振聩的效果。打开封闭的笼门,解放想象力和创造力,“换个‘俊鸟’进来”,才是各个IP未来走向的正解,一味在原来的电影语言和创作模式上内卷行不通了。“俊鸟”养成之前,又不能为渊驱鱼、过犹不及;笼子不能空,“老鸟”有老的价值。关键要“衔接得很好”,这体现着中国哲学“度”的辩证法。这种转变,对于《熊出没》的主创团队一定是艰难甚至痛苦,涅槃不是请客吃饭。

这里不揣冒昧,即以《熊出没》为例,给几个建议:一,改变定位,赋予这个IP全新的气质。现有的电影叙事模式,主要针对的是低幼年龄段的观众,随着他们的快速成长,他们对电影的期待会在青春到来时发生迅速变化,“老朋友”如果总是一成不变,肯定会被抛下。二,创新形象和故事,赋予影片全新的电影语言。画风要从二维、儿童画的风格进化到真正的三维、写实化的风格,如熊的造型要接近动物原貌,光头强的人设要更追求立体化和厚度,环境营造也要接近人类的真实视听感受。故事一方面仍然是幻想的,但又和现实(主要是青少年观众的生活)发生更紧密关联。由于要贴近青春期的心理,理想主义的色彩与迷茫求索的痛楚,对世界的热切期望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失望甚至痛苦等,都应该成为叙事的焦点和基调,当然最终要引向正确的价值观和更理性的理想主义。这样的创作,需要小心翼翼地寻找艺术和美学的一系列平衡点。三,继续经营并提升现有的童年“熊出没宇宙”,与新开发的青少年“熊出没系列”可以互动,两个产品链条也能互补,从而拓宽供应链和市场。四,开展一次深度的有实践价值的研讨,聚焦艺术和美学,对《熊出没》的经验和问题做充分的总结和思考。

最后一点,也是我们对中国国产电影创作和评论之间重建有机联系的一种期待。

《不说话的爱》:
柔情与涩痛交织的无声爱意

■文/乔沛蕾

法。她也只能声嘶力竭地喊出那句“我想和你好好说话!”在疾病面前,即使是最简单的对话诉求,也成了聋人及其身边人永远不能跨越的难关。

苦乐生活的诗意表达

影片用“去奇观化”的方式展示了聋人生活中的苦乐悲欢,摒弃了镜头对聋人群体的好奇凝视,用更具诗意的方式展示出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导演有意识地运用高饱和暖光以及色彩,营造出独属于木木和小马的乌托邦世界。木木出场时身着明媚的黄色上衣,拿着黄色气球行走在人群中,即使是帮小马找临时工作也斗志昂扬。她的色彩象征着聋人父亲守护女儿的物理坐标,更暗喻木木是这个残缺家庭不会熄灭的生命热力。通过高饱和暖光与过曝的结合,影片在小马艰辛的生活背景下切割出一方父女的情感天地。当二人在床边玩手影模仿鸽子飞翔时,逆光为他们勾勒出一条金色轮廓,细小的尘埃就在镜头下如鸟儿翻飞,让他们的剪影充

满脉脉温情的意蕴。

在意象符号层面,鲸鱼这一反复出现的意象成为诗意的注脚。小马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动听的声音,是木木让父亲触摸自己声带的震动。她告诉小马,“鲸鱼不是不能说话,只是它们的声音只有朋友才听得见”。在两人的身后,摆放着的就是巨大的鲸鱼鱼干,在默默注视着他们无声的爱意流动。聋人所面临的生理残缺就这样被诗化地解读为深海巨兽的低频吟唱。而小马和女儿之间相互依偎取暖的生存方式,也和深海之下的鲸鱼族群形成某种共振。

纵观沙漠导演此前的作品,他习惯性运用舒缓流畅的钢琴曲或变奏后的流行音乐贯穿叙事。有时导演在创作过程中也存在着对于音乐的过度依赖,影片《我要我们在一起》就曾因音乐的过度使用而被观众批评,认为观感更像是MV而非电影。但是在本片中,音乐不再只是外在的情绪催化剂,而是在丰富视听的基础之上,承担起语言的职责,填充聋人在交流之际的声音空白。影片在展示小马和木木的温馨生活碎片时,没有使

《不说话的爱》:
温情亲子戏却长出罪案片的“尖牙”

■文/周舟

鼓起巨大的勇气来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当他们遇到什么不公的时候,他们也不敢反抗,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忍。”

《不说话的爱》实际上把《搭错车》式的类型范式反用了,不是残障父亲保护女儿,而是健全女儿作为耳朵保护着残障父亲,当女儿被前妻带走,失去耳朵的残障父亲堕入黑暗,这种与之前父女结伴时的明媚形成的巨大反差,恰恰是一个残障人士真实的日常。一个聋人,他的世界多么的逼仄,就像被困在一个四面无窗的黑匣子里。只要他挪开视线,就会立刻失去跟面前的人的沟通,工作中他们随时都会出错,导致失去工作。因为找不到工作,就更容易陷入经济困境,而因为陷入经济困境,就更容易失去很多东西,比如失去女儿的抚养权,而为了保住这些他们不愿失去的东西,就更容易上当受骗甚至走上歧路,用片中犯罪团伙伙犯的话说,“聋人又傻又好骗,说什么他们都信”。地狱级的人生多米诺啊,第一块一旦倒下,后面的根本扶不起来。

影片高潮非常残酷地具象了聋人男主角的“傻和好骗”,他太恐惧眼前这个他看不懂也无力面对的世界,在这种巨大的恐惧之下,他会做出正常人完全无法理解不合常理的行为,甚至遭到拒捕、袭警,甚至傻到一人包揽所有罪行,以为自己快点签下认罪书,就能结束这一切的麻烦,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犯罪片特有的尖锐叠加对残障人士被禁锢的人生的细节描摹,真的刺痛了我,这种痛不仅作用于泪腺,还作用于脑,我愿意在今后为残障人士付出更多的关心,并且思考怎样才能从制度上、体制上更好地服务于他们。

《不说话的爱》是一部将类型骨架与微观细节、情绪冲击结合得很好的影片。近年来口碑、票房都不错的国产影片均兼顾了这三点。著名电影学者尹鸿在朋友圈发过一段话,深有同感:“电影为了追求强度性,人物都越来越往极致上设计,但是,所有的‘极致’都必须来自共同人性和特殊性对‘特定场景’的‘自然’和‘或然’反应。否则,人物就会失真变形,电影故事的根就断裂了,观众就会出戏。”

在大银幕放映需要购票观赏的电影究竟怎样才能吸引观众,来自好莱坞的既往经验是给观众提供高于生活的奇情、奇观。这种追求情节奇情化、场面奇观化,确实提供了观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经

历体验的高能量高刺激高起伏,但双刃剑的另一面是银幕上展现的生活跟观众已经没有任何真实生活体验的链接,很难使观众从内心产生情感认同。离奇古怪的事,看看热闹就得,谁也没往心里去。再刺激的东西,看多了也会疲惫。近年来,好莱坞生产的这种架空的不沾地气的高概念电影,在中国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观众中在逐渐失去吸引力。

反观跟好莱坞电影形成鲜明对比的日本电影,往往反映的是生活中一段普通而常见的情感关系的始终,一次小小的波澜,一点“小确幸”,却在都市年轻人中拥有稳定的甚至逐渐增多的拥趸。其实之前我不太理解,这些看来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日本电影究竟好在哪里。也许它们就好在能跟普通人产生真实的情感链接,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成为英雄,即使是英雄,在他(她)人生中绝大多数时刻也并不作为英雄而存在,这些电影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通过银幕照见自己。这种深层的情感认同,比眼睛冰激凌、肾上腺素的爽,更实在也更持久。

这种看似普通的电影做起来并不简单,对文本的要求很高,需要创作者从看似一潭死水的生活里采撷转瞬即逝的浪花与漩涡,编织成似真又非真的情节链条,并用大量具体微观的细节与心理呈现丰盈充实戏剧骨架,给予观众真实的、切肤的,能够浸润到毛孔里的氛围体验与感受。所谓情绪电影、感受电影所能提供给观众的价值正在于此,在《蓦然回首》中我就难得品味到一个普通人的奋斗青春,毫无狗血,平平无奇,只有一日日的伏案奋笔,一笔一划地勤奋而笨拙地描绘着将来并不可知的自己。

这对于多年研究好莱坞类型片的我而言,是一次类型经验的刷新与升级。类型必须根据观众尤其是新生长起来的年轻观众的生活方式、审美取向、关注焦点进行迭代切换。我们在做类型片的时候,谈论类型片的时候,除了以往强调的高情节、高起伏,做好规定类型的几个大节拍、转折之外,同样也需要提供给观众切实的有质感的能够让人觉察、能够让入体认的普通人的生活细节,能写惊雷,也能画平湖,只有这样才能成就一部观众不会“阅后即焚”“爽完就忘”的隽永经典的类型片。事实上,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类型片也正是这样做的,那时的类型片链接的可是奥斯卡,不是爆米花。

由沙漠导演,张艺兴领衔主演的影片《不说话的爱》于4月3日登陆院线,成为清明节档期备受关注的影片。该片着力摹写聋人小马的生活苦乐以及为女儿破釜沉舟的人生经历,以小见大地展示出听障群体的真挚情感与生存境况,为观众提供了一次反思社会、叩问现实的契机。影片突破了《小小的我》等残障题材作品惯用的温暖现实主义范式,将残障群体置于类型叙事场域,创新性地设置犯罪类型与亲情伦理的双重叙事脉络,触及更多此前未被讨论过的残障困境,被观众认为“很治愈很有爱”。

平等尊重的对话视角

《不说话的爱》试图用影像呈现出聋人的生活状态以及情感交流,让观众从喧嚣的世界中短暂抽离,关注一段静寂的人生。影片对于聋人的生活展示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同情俯视,更不是苦大仇深地发出“救救聋人!”的呐喊,而是一直传递着尊重平等的对话态度。特写、平视镜头与手持摄像交织,呈现出一以贯之的倾听态势。在直击心灵的注视中,在微微晃动颤抖的画面中,影片得以最直接地触碰角色细腻脆弱的情绪脉搏,让聋人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自我表达和倾诉的权力。

电影中对于静默的多次使用也能让观众更切身地进入到聋人的世界。在女

用一句台词,主要通过流畅的钢琴曲作为纽带,将小马最朴实幸福的日常生活谱写成散文诗。

类型杂糅的冲突叙事

迥异于传统影片对残障人士书写时惯用的现实主义影像风格,该片叙事线的前后两部分有着类型上明显的不一致。导演沙漠在早期的短片创作中就开始探索悬疑、犯罪片的类型。在《不说话的爱》中,导演也将犯罪类型和亲情叙事进行糅合。影片前半段细腻铺陈的父女温情,与后半段急转直下的犯罪情节形成尖锐的对立。在影片前半段,为突出木木幸福的成长环境,影片有意识地规避着暴力和冲突,并对其进行泛喜剧化处理。即使是麻将馆里聋人间的小争执,也通过播放变奏后的儿歌《我有一头小毛驴》,被戏剧化地处理成一场舞会。不合时宜的儿歌以及争执的解决,一方面体现着聋人群体对木木的关怀,同样也暗示在木木视角下,聋人群体的生活底色始终是温暖柔和的。

然而随着前妻的登门拜访,小马和木木的生活状态急转直下。小马为了赚钱打官司,不得不从两人的乌托邦中出走,甚至在手语翻译的欺骗

下,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这种将美好生撕裂的叙事手法,不仅强化了戏剧张力,更让观众残酷地体验到小马所面临的疾病焦虑、来自听人的欺骗危机以及失女痛苦。此时影片的剧情视角已然发生改变,从木木的儿童视角转变为听人的全知视角,镜头也不再回避暴力冲突。当小马屡次撞车骗保时,交叉蒙太奇中,木木的天真笑靥与小木马伤痕累累的面容形成残酷的并置。特写镜头下,脖颈伤疤化作主流社会的暴力符号,成为社会对聋人的忽视以及无意识冷漠的具象化呈现。

《不说话的爱》作为一部聚焦残障群体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公众对聋人群体的刻板印象,帮助聋人更好融入主流社会。当然该片也面临着来自外界的质疑,比如有观众评论称,影片对于聋人的困境表现过于极端,机场和法庭的戏份太过直给催泪。但是瑕不掩瑜,《不说话的爱》抱着对社会以及人情性的思考,对残障群体进行深度体察,这种努力还是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认可。在我国,对于残障群体的关注和书写毫无疑问还有着更大的潜力空间。未来,创作者应切身关注边缘群体的真实困境,以尊重平等的态度创作出更多贴近现实、回应大众期待的优秀作品。